

[澳] 约翰·伯顿 著

谭朝洁 马学印 译

GLOBAL CONFLICT: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JOHN W. BURTON



全球冲突

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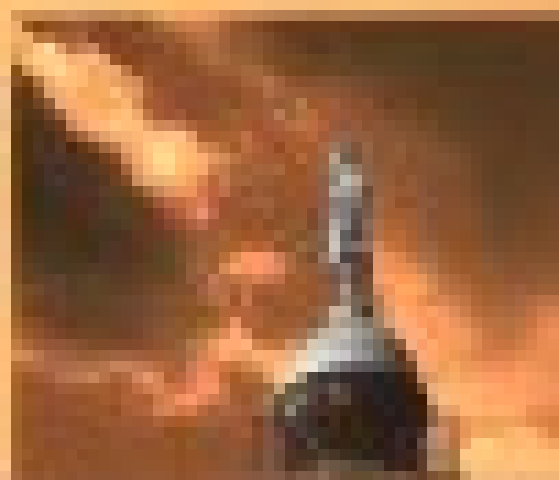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三版 增订本

ISBN 7-309-05100-1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国际冲突研究的成果，也是作者在国际冲突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本书从国际冲突的根源、国际冲突的类型、国际冲突的演变、国际冲突的解决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国际冲突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



全球冲突

国际冲突的国内根源

作者：[美] 詹姆斯·米歇尔



[澳] 约翰·伯顿 著

全球冲突

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

谭朝洁 马学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澳)伯顿(Burton, J. W.)著；马学印，谭朝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书名原文：Global Conflict: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ISBN 978 - 7 - 208 - 06596 - 3

I. 全... II. ①伯... ②马... ③谭... III. 政治危机—研究—世界 IV. 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112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方 已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

[澳] 约翰·W. 伯顿 著
马学印 谭朝洁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42,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6596 - 3/D · 1146
定 价 20.00 元

目录

中文版序/1

中文版序言（大卫·J. 邓恩）/5

1984年版序言（爱德华·阿扎尔）/11

前言/13

第一部分 绪论/17

第一章 研究方法/19

第二章 公共政策哲学/31

第二部分 制度的缺陷/41

第三章 个人与政治/43

第四章 权贵与“共同利益”/50

第五章 越轨与异端/58

第六章 衰退还是不发达/63

第七章 中央政府和人民/80

第三部分 国际影响/95

第八章 联合国的缺陷/97

第九章 区域一功能化体制/101

第十章 弱小国家的作用/109

第十一章 苏美关系：法律规范/114

2 全球冲突

第十二章 隐含的事实：动机与意图/122

第四部分 解决问题的方案/131

第十三章 变革的问题/133

第十四章 交互作用的决策/139

第十五章 双赢理论/145

第十六章 问题解决程序/151

第十七章 第二轨道外交/161

第十八章 学者的作用/169

第五部分 结论/175

第十九章 问题的领域/177

第二十章 程序问题/186

跋/193

参考文献/195

译后记/201

中文版序

本书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令我非常欣慰。我于 1952 年去过中国，当时，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时，我带上了时人送与我的一幅中国画。我非常喜欢这幅画——历经 50 年沧桑，我依然每天欣赏着它。

当初离开中国时，我深刻地感觉到，由于中国革命及实践革命的领导者们的努力，人性问题再次处于重要的抉择关口。我当时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怎样才能确保不像旧制度（包括苏联体制）那样走向自我毁灭，并为别国树立榜样。

人类进化过程受环境、资源及社会变革的制约，它将人类带向十字路口，迫使其对未来的道路作出各种不同的选择。选择的作出几乎总是会最大限度地有利于那些正在寻求自己眼前利益的人。离开中国时，我曾带着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此刻能否选择一条面向未来的、非权宜之计的道路？

直到 30 年以后，我才着手写《全球冲突》一书。正是在这 30 年间，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当时正值全球化的形成时期。今天，国际冲突日益频繁，冲突明显与国内根源相关，比如国内收入及机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领导不力。

找寻全球冲突的国内根源以及避免这些冲突的手段已经成为

一项不懈的努力。在《全球冲突》一书中，我试图对冲突以及冲突的根源加以阐释，并探讨解决冲突的可能方法。

若把当代问题放在人类进化的大背景下审视，它仍然富有启发意义。几万年前的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不得不顺应新发现的农业生产方式。在那个抉择关头，人类的选择集中在是进行合作、分享更大的利益，还是控制旧有的、已经分享到的领地——一个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应用生产技术的领地，而人类的大多数则成为这些少数人的封建农奴。新制度终于战胜了旧制度。产业随着新的发现而逐渐发展起来，而劳动者却受到进一步的奴役。

在随后的抉择关头，虽然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人类组织形式，但人类关系依然以对抗性的制度为基础。人类确已对制度进行了调整，并采取了一些资源分享的小步骤，但很少踏上通向民主——民治、民享政府——的道路。现今的法律观点认为，有人有权决定关系的准则而有人有服从它们的道德义务。

所谓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越发达，等级差别就几无例外地越加明显，进而导致围绕由谁来控制劳动条件、税收水平、健康、教育以及福利政策的斗争。这种斗争发生在有反对党的环境里，发生在腐败、犯罪率上升、自杀和抗议运动的环境里。执政党对反对党派反应则是建立情报机构，授权这些机构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具有威胁性的人物投入监狱。“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惧心理的蔓延为这些手段找到了理由。官方没有采取措施来研究抗议运动的起因，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调整。“民主制度”的领导者们过于频繁地扮演着独裁者的角色，他们将下层阶级的成员送向战场，为争夺资源（如石油）控制权而开战——这些都是在没有征得他们国民的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简而言之，发达的“民主国家”现今变成了法西斯组织，而它们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法西斯的那些民主国家。它

们在军事上赢得了战争，现在却在道义上输掉了它。

今天有如此多的明显分立的关注领域出现并汇聚起来——文化—民族—边界问题；领导问题；犯罪、社会心理及社会动荡问题；为防范恐怖主义活动而漠视人权的问题。这使我们难免会得出我们的文明正陷于危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一历史性的抉择时刻，革命后的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一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机，向一个稳定的世界社会迈进。

这一转折的方向在哪里？理想社会有哪些特征？需要建立起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架构和制度？

人类在发明和科学探索上取得了令人称奇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人类的生活水准得到不断提高。但同时，人类未能克服政治和行政制度上的缺点。人类明显有必要不断进行研究与创新，处理好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已经达到足够的高度，知道人类有树立个体意识的基本需要，并希望他或她在其所处的社会中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得到承认。这是人的一种需要，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衣食住行。

对全社会公认的集体认同感的否定（这在当前许多社会里并不鲜见），不可避免地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如家庭和社会矛盾、团伙盗窃、破坏财产以及文化暴力。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可过分强调把人类需要一定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人类明显有必要把自下而上的决策和自上而下的决策二者相结合。

今天的中国正探索着各种发展方案。未雨绸缪、防止重蹈旧制度堕落以至灭亡的覆辙或可为之明鉴。这要求对可能的毁灭性根源持一种富于想像力的思维——如决策者脱离社会成员、与他们不断变化着的价值观与需求相疏离；政治权力由富有的少数人行使；情报机构侵犯那些反对现行政策的公民的人权。

我希望看到中国主办由中国政治理论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大国政府代表共同参加的年会，共同讨论人类福利和社会改革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举办这样的会议可为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为全球从冲突和暴力走向合作而非对抗的制度奠定基础。这样一个探讨各种可能性的会议机制可由印度、日本、美国及其他面临上述问题的国家参与。

最后，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同人的倡议，将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来结集出版。我的版权代理人陈青为《全球冲突》一书中文版的出版以及为本序言的约稿付出了宝贵的时间，我亦在此特致谢意！

中文版序言

对于一个从未想要涉足学术领域的人，约翰·伯顿发表的 20 余部著作和无数篇文章却是引人注目的。他在祖国澳大利亚政府行政部门开始职业生涯，后移居英国，再后又去了美国。除发表著述外，约翰·伯顿还帮助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和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在他的著作中，《全球冲突》当属最重要的一部。

此书初版（英文）于 1984 年问世并在读者中广为流传，两年后便加印。我当时认为，而且在 20 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认为，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表明一本书所具有的实用性。早在冷战结束之前，许多在今天被排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很少为人问津，而伯顿恰恰做了两件事：他首先对人们常说的将政治、社会制度组织起来的“传统智慧”的局限性进行了阐释，然后指出另一套可选的思想体系应具备的要素——伯顿的目的不是单纯改善这些社会—政治制度的效能，而是要把重点转移致使这些社会—政治制度起码在法律和宪法基础上能更好地适应该制度中最重要的人们——不是领导者，而是领导者的服务对象——的需要。

对于其中的第一项，政府当局传统上将权力作为手段来对制度施以控制并强制推行秩序和管控。其理由是防止失序、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但这却使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变得不纯，

致使“秩序”实际上被转化为满足制度掌控者需要并为他们服务的工具。因此，（自二百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今已遍及全球）公司领导者通过实施劳动纪律和僵化的规章来强制推行秩序。校方制定各种惩罚条例和规矩，并将这些条例、规矩作为教人从善的手段。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为了维持秩序，可以把违法者监禁起来，甚至将他们处以死刑，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和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此的一种辩解是，对一些人进行惩罚将震慑其他人——可以断言，震慑能产生威慑作用。

在国际政治领域，整个冷战时期的核扩散正是产生自对威慑的这种倚赖，以致到冷战末期，竟有 50000 枚之多的核弹头存在于世——这与大国的需要以及与维护秩序、稳定的需要是相一致的。伯顿（以及和平研究领域的其他开拓者，其中包括肯尼斯·博尔丁 [Kenneth Boulding] 和约翰·加尔通 [Johan Galtung]）发现全球范围在实现和平的问题上存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他还认为，在社会层面，当局的政策和策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适得其反的。他进而指出，决策者由于“错误界定形势”而经常出错；在此种意义上，当局从一种特殊的价值、需要、利益角度来解释“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因其在澳大利亚外交决策部门工作的丰富经验，伯顿深知所谓的“现实世界”的本质所在）。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被框定在一个预先设想的模子里。在美国看来，越南人当年力图实现的变革注定属于“共产主义”主宰全球计划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寻求的变革被断定具有威胁性，因而必须加以抵制。众所周知，这项抵制政策遭到了惨败。而苏联则是把遇到的变革运动视作对其自身权威的挑战，并诉诸高压统治（比如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苏联的惨败则是走向崩溃、瓦解——由于高压控制被明确用作维持秩序的手段，苏联不可能找到变通的变革反应机制。

那么，什么是变通的手段？伯顿一步一步提出把人类需求作为问题的关键着眼点。伯顿在这里找到了思想上的突破口，并由此提出了“遏止”（prevention）概念。“遏止”的含义不易理解，即便在英语里面，也令许多人费解。我们可以对其作这样的解释：人们为什么抱怨家庭、学校、工厂、机构以及更广范围的社会权威？其原因在于他们感觉到他们所置身其中的制度不能服务于他们的需要，或这些制度不允许他们自身的需求得到满足。如若情况如此，且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制度的本质则会受到质疑。当局者的反应常常是诉诸代价高昂的措施，确保管控和守法。被监禁者人数和困难孩童人数增加，家庭破裂，工人质疑经理的决定。当制度事实上本该适应新的需求时，变革却遭到遏止。对基本变革的抵制有一个新近的例子，那就是2005年12月欧盟围绕预算与改革所进行的讨论。

制度未能适应变革的需要。再者，变化是不间断的，就适应变化形式的相关政治而言，这种变化却鲜为人知。与伯顿开始外交生涯时的那个世界相比，今天的世界发生了急剧变化——但没有变化的是：当局者仍然倾向于依仗权力和行使权力，而不是依靠有力的决策去促进变化。摆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的主旨表明，为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局势而采取一种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新方法的核心要素，在伯顿看来，也是必要的要素。我们需要着力解决人的需要问题，并逐步完善我们的策略以满足人的需要——它有别于物质上的需要。在本书以及其后的著作中，伯顿始终强调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对归属感、被承认、被赋予价值并获得相应地位的需要。当这些需要被忽视，问题就会出现。当这些需要被满足，许多社会—政治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而不是被管控）。伯顿的其他许多著作都把如何解决冲突作为研究重点。此部著作将需求、冲突、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结合起来进

行了综合论述。

此部著作在中国出版使我得以借此机会评论自它在 20 多年前问世以来世界局势所发生的变化。最重大的变化是，冷战已经结束，“全球化”变为我们关注的议题。特别有趣的是，一些人依然怀念冷战时代那种旧有的确定性——当时，“情境界定”具有明确性，相关政策具有直率性。自冷战消亡并向“世界新秩序”（显然不是布什所倡导的那个“世界新秩序”）过渡以来，我们不得不应对失败国家、种族清洗、战犯法庭、移民以及“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等问题。

这凸显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本质性的关系问题、制度中权力和职权如何定位的问题，以及如何恰当应对突发事件的问题。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一时间，易受攻击性和不安全性在增加。在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政治被广泛认为与公民日常关心的问题无关。随着人们恐惧感的加深，国家安全也成了私人经营的产业。对大多数居住在发达的西方世界的人来说，这便是一个富足世界的一切。

在世界其他地方，贫困、死亡则是普遍现象——这些地区的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罗列起来已经太多并广为人知，所以不必在此赘述。但是，人们仍然作出与过去一样的反应：必须以战争来击溃“恐怖”，必须以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对决来将其击败。只是问题不像有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泾渭分明。恐怖分子不是愚笨无知的傻瓜；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在美国的攻击目标不是随机选择的，相反，这些目标具有标志性意义且经过了精心策划。问题的根本在于：“恐怖主义”的症结何在？本书正好提供了一套有用的参照体系，有助于我们从中找到答案。除极少数例外，恐怖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其本身。为使恐怖主义停息——不是通过“战争”“击溃”恐怖主义而是通过

使恐怖主义不被作为诉求方式——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在《全球冲突》的语义中，21 世纪的前十年是一个被富足中的贫困、暴力、不安全感所包围的十年，是一个面临变革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处于争论焦点的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什么呢？

在进入这个讨论领域前，我认为，本著作中文版尤其切合时宜且不同凡响。美国现在被锁定于特定的“情境界定”而不能自拔，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上各行其道，欧盟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六国经济共同体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与其 40 年前相比，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些变化过程中，适应是关键。中国现阶段的变革是迅速而巨大的；在全球化时期，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世界观。一个迅速变化世界中迅速变化着的中国为判断它所面临的形势，将从过去 50 年的经历中得出哪些教训呢？相当重要的是，中国在迅速向前迈进的同时，有机会从别国制度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失败的代价已然相当巨大了。

我认为，对于思考变化世界中的可能目标，《全球冲突》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此书并未给出所有答案，但它的确能向我们呈现一套完整的思想框架——一套切合时代需要、发人深省并有助于制定一整套综合计划的思想框架。近来阅读此部著作，我为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感所触动，而且，它在 20 多年前就已经问世，所以，它也是一部超越时代的著作。这正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它理应拥有广大的读者。

大卫·J. 邓恩 (David J. Dunn)

基尔大学研究员

2006 年 1 月

1984 年版序言

约翰·伯顿通过写作《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包括国际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优劣。经过多年杰出的外交活动和学术研究，伯顿得以用简洁的笔触将自己学到的、提出的、实践过的、写作过的和讲授过的诸多观点和看法传授给我们。本书提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凯恩斯的《经济学绪论》。我认为全球在社会和政治上如此扭曲反常和危机四伏，以致我们必须诉诸本书即伯顿的“绪论”所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措施。

伯顿指出权力政治模式已经过时，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侧重于当代社会中的交易（trans-actions）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的作用。伯顿令人信服地指出，权力关系理论无法解释苏联为何担心波兰发生的事件，更无法解释美国为何担心中美洲社会政治局势的发展。他指出，运用权力来寻求国家利益的诸国，会发现自己受到具有重要意义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的限制。因此，他的结论是，权力在寻求有价值的关系方面只能起辅助性作用。

伯顿在此书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是，权力理论家们完全是错误的，世界正渴望着满足个人身份和集团的同质性需要。安全不